一部颇具特色的人物传记

——读《清帝列传·嘉庆帝》

宋德华

为历史人物立传是史学研究的一项重要工作，而中国历代帝王作为王朝的最高统治者，其生平事迹往往就是当时政治运作、社会概貌乃至时代变迁的缩影，因此尤为治史者所注目。近十多年来，史学界贯彻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方针，在历史人物包括帝王将相的评价上一反过去公式化、脸谱化、绝对化的错误倾向，力求真实可信、客观公正，取得了一批可喜的成果。吉林文史出版社在1993年出版了大型清史丛书《清帝列传》，在史学界和广大读者中产生了广泛的影响，获得一致好评，其中由著名明清史专家关文发教授撰写的《清帝列传·嘉庆帝》(下简称《嘉庆帝》)，不仅为该套丛书中篇幅最大的一部，而且从学术性到思想性、从指导原则到具体写法都颇具特色，堪称是反映和代表了史学界评价历史人物新风气、新水平的力作。

要写好一个历史人物，首要的一条，要高度忠实于历史事实，既不神化，亦不丑化，真正还其本来的面目。在这方面，《嘉庆帝》一书作了很大的努力，突出表现在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敢于为一位长期受误解、背黑锅的皇帝进行实事求是的辨正。嘉庆帝在位的年代(1796～1820)，正是清王朝由盛到衰的重要转折时期。终嘉庆一朝，中国社会内部战乱频仍，外部危机四伏，呈现出衰败之象，这与乾隆全盛时期“开疆拓宇，四征不庭，揆文奋武”的宏伟气象，形成了十分鲜明的对照。据此，人们过去对嘉庆帝的印象很不好，以为是他一手造成了清朝的中衰，既然是中衰之主，其昏庸和腐朽也就不言而喻；甚至连嘉庆帝亲政后立即抄斩大贪官、大权臣和珅这样的大好事，也被说成是“和珅跌倒，嘉庆吃饱”，意即嘉庆帝抄斩和珅无非是为了贪图钱财。这些看法歪曲了嘉庆帝的真实形象。作者以严谨的科学态度对大量史料进行了研究和考订，以事实为依据，以历史唯物主义为准绳，着重从两方面对嘉庆帝作了重新评价。第一，指出导致清代中衰的根子不在嘉庆，而在以“十全”功业著称于世的乾隆。作者一方面充分肯定乾隆帝曾经以非凡的才能和勇于开拓的精神造就过有清一代的极盛局面；同时又深刻剖析了在其统治之下特别是在他的晚年所存在的四大严重弊端：一是乾隆帝一生引以为荣、官修史书一片颂扬的“十全武功”虽有其历史功绩，但亦为此而付出了极其巨大的代价，庞大的军费开支，大量耗费了历年国库积蓄，贻祸于后世。二是乾隆帝好大喜功，热衷于南巡、千叟宴之类的游玩和庆典，肆意挥霍，劳民伤财，使官风不正，民风日下。三是宠信和珅，使其前后柄权达20多年，以致上上下下官吏贪墨成风。四是作为清朝立国基干力量的八旗兵及代之而兴的绿营相继腐败，军备严重废弛。因此，清室的中衰，实始于乾隆后期。乾隆交给嘉庆的，并不是一个欣欣向荣的太平盛世，而是一个内创累累、积重难返的疲败之局。第二，实事求是地指出嘉庆帝25年的为政是有所作为的，也是尽心尽力的，绝非人们过去所想象的那样腐朽和昏庸。这主要表现在嘉庆帝能够清醒地认识他所面临的内外交困的现实，从而兢兢业业、力所能及地对乾隆晚年的种种弊政进行弥缝匡救，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住危机的恶化；坚持身体力行的准则，带头崇俭黜奢，倡勤戒惰，除虚务实，以此作为整饬吏治、清除积弊、挽回颓势的重要手段；从“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的宗

旨出发，比较注意体恤民间疾苦，对任意开捐、议增盐粮官价、折色浮收之类作法持慎重态度．对赈灾、蠲免、治河、理漕等项工作躬亲其事，对侵吞赈款的贪官污吏惩处较重，从而使动荡不安的社会局势得到一定程度的缓和；实行较为谨慎的睦邻政策，严禁鸦片，对当时世界上头号殖民霸主英国日益加剧的侵略活动持坚决抵制的态度，使嘉庆朝在当时世界局势激烈动荡、殖民主义异常猖獗的背景下，对外交往基本上没有出什么大问题。对于人们误解最深的和珅一案，书中作了专门的辨析，以令人信服的论据证明，抄斩和珅虽然不可避免地涉及钱财问题，但主要目的是政治性的，诛和珅是为了严肃纲纪、整饬军备和安抚民心，这对于挽救清朝的衰危之势而言，不仅十分必要，而且非常关键。

当然，任何历史人物的活动，不管值得肯定还是应当予以否定，都不可能是孤立的个人的活动，而总是在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进行，不可避免地受到社会历史条件的制约。《嘉庆帝》一书，始终把传主置于特定的社会历史的大背景中来研究，无论是对嘉庆帝个人特征的探索，还是对其为政举措的考察，抑或是对其一生得失成败的评判，都无不与其生活的环境和时代紧密联系起来，从而在历史的表象与历史的本质、个人的命运与社会的规律之间搭起一座由此及彼的桥梁。例如，嘉庆帝为了扭转清朝的中衰之势，曾经作出过种种努力，然而终究未能从根本上改变这一历史的趋势。对此，书中从多方面加以了透视。首先从总体来说，清王朝自入关算起到嘉庆朝已经历了 150 多年的统治，封建机制所固有的各种矛盾都在深化和激化，清王朝的衰败，实际上已经和整个封建机制的衰败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并且已成历史必然之势．嘉庆帝虽力图挽救，充其量只不过起着某种延缓的作用，要想从根本上改变这一总的趋势是不可能的。其次从封建统治者的本质来说，嘉庆帝对频繁发生、持续开展的人民起义不可能不全力加以镇压，为此他在位期间不惜动拨了上亿两的巨款，虽然暂时平息了战事，却使国家和社会的元气大伤，使中衰之势不可逆转。最后，与整个封建机制的衰败一致，嘉庆帝也几乎完全丧失了其列祖列宗曾经有过的锐意进取、开拓前进的勇气，他在自给自足的封建经济的泥潭里陷得越来越深，将闭关自守的大门关得越来越紧，作为一名封建帝王，他个人无法为一个古代业已走到了尽头、近代又尚未开始的衰落社会找到生机和出路。因此，以匡救弊政来衡量，嘉庆帝称得上颇有建树，而从中衰之势的根本改观来看，他又几乎毫无成绩；作为守成之主，他克尽了自己的责任，而对拓展开新之业，他又显得那样力不从心；他自我严格约束的个人品德无疑值得赞颂，而他处理国政的诸多保守僵化之气又令人摇头叹惜。之所以如此，当然不乏嘉庆帝个人方面的种种因素，但更重要的、起决定作用的还是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通过这种透视，对嘉庆帝的评价就在“辨正”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化、完整了。

研究历史从来不能脱离现实，研究历史人物同样如此。嘉庆帝从政于兴衰更替的重要年代，他的事迹中无疑有许多令后人咀嚼回味、掩卷沉思的东西，作者对此进行了深入的发掘。如嘉庆帝实行俭政，在于他懂得上梁不正下梁歪这个简单而深刻的道理，因此为刹住官场上的歪风邪气，不只是颁布一些冠冕堂皇的政令了事，而且切切实实地从自己做起，先正己后正人，绝不含糊敷衍，从而使乾隆以来的竞尚奢靡之风有了很大的转变；他的勤政是针对官吏中普遍存在的疲玩萎靡、因循怠忽、所谓“大法不犯，小错不断”的顽疾而施加的药石，既为自警，又为儆戒百官，使诸臣在勤政方面有所改观；他的实政则反映出他敢于面对现实、十分讲求实效的求实务实精神，从而使官场上那种弄虚作假、蒙上欺下的恶习一度有所收敛。这些对后人都是很有教益的。而作者分析更多的还是嘉庆帝留下的教训，也就是他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有可能做到或者做好，结果却未能做到做好的那些事。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方面的分析对于后人更为重要。

教训之一是嘉庆帝从政虽以革新始，却以守成终，所以终未取得更大成效。嘉庆帝亲政伊始，对乾隆后期的种种弊政多有更张，在政治上确实使人有耳目一新之感，然而他很快便从革新的起点上退了下来，一味求稳怕乱，不愿意因深入变革而坏了"法祖"的美名。而事实表明，要改变当时严重疲败的政局，不大胆变革是没有出路的。教训之二是在整饬吏治上劝诫多而惩办少，未能达到预期目的。嘉庆帝对于吏治腐败的严重性和整饬吏治的迫切性是清楚的，在位其间也确实查办了不少贪赃案件，惩处过一批贪官污吏，但总的来说仍然失之过宽，缺乏一种雷厉风行的气势。或者是以"事属既往，姑不深究"，屡搞"下不为例"；或者是以"嗣后一经查出，必当从重治罪"，进行虚声恫吓。然而这些对于积习成性的贪劣官员来说，早已失去了震慑力而变得无济于事，所以不管嘉庆帝如何"舌敝唇焦"、"随笔泪洒"，也难以使他们改悔过来。教训之三是在经济方面嘉庆帝墨守成规的思想尤为突出，严重束缚了社会发展的生机。当时，社会经济长期停滞、不断衰退的形势本来已十分严峻，但嘉庆帝仍死死抱住"重本抑末"的传统政策不放，不仅没有采取任何得力措施给社会经济发展以新的活力，反而在矿业、出关耕垦等方面实行比康、乾时代更为保守、僵化的政策，对社会经济的发展造成极其不利的后果。教训之四是在对外政策方面始终深闭固拒，无异于自我扼杀。嘉庆帝禁止鸦片贸易、严防白银外流的政策是正确的，但对于固有的闭关政策却不作任何松动，甚至对通商口岸、出口货物、营运方式等，较之过去限制得更死。他对殖民主义的侵略企图保持着警惕并给以必要的反击，但对于西方任何先进的科学技术和文化却一概采取排斥的态度。闭关锁国、固步自封的后果只能是窒息自身的生机，拉大与时代的距离，并且预示了清朝后来在反对英国侵略战争中的失败。这些经验和教训的总结，将深沉的历史感与鲜明的现实感融汇在一起，使读者更强烈地感受到史学所特有的功力。

人物传记的写法是多种多样的，采取何种写法，要视传主的具体情况而定。就嘉庆帝而言，史学界过去对前清史的研究大多集中于康、雍、乾三朝，对于鸦片战争前夕的嘉、道时期却注意得很不够，研究得很不充分。在此情况下，为了深入探讨清代前后期交替的客观规律及主观因素、清代中衰的基因及其历史进程等重大问题，弥补清史研究的空白，作者采用了可读性与学术性相结合，而以学术性为主的写作方法。其可读性主要体现在篇章结构的简明、语言文字的生动活泼、记叙和议论的深入浅出等方面。其学术性则主要表现在书中引用了丰富、翔实的历史文献资料，并据此对许多重要问题作了深入细致的探讨。如论嘉庆朝言路与洪亮吉事件。书中专门列为一节详引史料加以剖析，一方面肯定嘉庆帝亲政初期对广开言路、兼听纳谏的确决心很大，也取得过相当可观的进展；一方面指出以发生洪亮吉上书事件为标志，嘉庆帝在广开言路上全面倒退了，他对这一事件的错误处理及后来改正又不彻底，对开通言路投下了巨大的阴影，使刚亲政时所出现的那股好势头很难恢复过来，甚至是每况愈下，因而嘉庆朝的言路一直似通未通，嘉庆帝是应负主要责任的。这些独到的见解既有助于学术问题研究的进一步深入，又显示了作者的严谨治学态度和深厚功力。

总之，《嘉庆帝》是一部颇具特色的历史人物传记，通过该传使人们对嘉庆帝及其所生活的时代获得了一种相当真切而且相当深刻的了解和认识。对于撰写其他历史人物的传记来说，这些特色无疑也提供了十分有益的启迪。同时，该书的出版不仅填补了清史研究领域的一大空白，而且对于进一步推动清代中叶学术问题的研究将起到良好的和积极的作用。